

# 古埃及文明的承载之地

## ——埃及国家博物馆

肇东

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要：**本文围绕埃及国家博物馆展开，梳理古埃及文明的兴衰史（古王国时期确立法老专制—中王国时期驱逐外族—新王国时期文明巅峰）以及埃及国家博物馆发展的历史脉络（布拉克博物馆—吉萨临时馆—埃及国家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解析古埃及文物流失的历史原因（外族劫掠以及总督私占）以及博物馆在不同时期对文物的诠释方式。以埃及国家博物馆在演变过程中的教训和经验为鉴，对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和建设提出些许建议。

**关键词：**古埃及文明；布拉克博物馆；吉萨临时馆；埃及国家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

### 一、古埃及文明的兴衰与文物的流失

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下游，约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前 5000 年出现了群体定居和农业耕作。公元前 4000 年，40 余个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城邦（州）形成，伴随金属工具的使用，催生出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尼罗河谷最终形成了上埃及（南部的涅伽达文化）与下埃及（北部的玛阿迪文化）两个文化族群。公元前 3100 年，上埃及美尼斯王完成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法老”成为最高统治者，掌控着全国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古埃及文明的发展可分为三大时期：即古王国时期（金字塔时代）、中王国时期（艺术复兴期）和新王国时期（帝国扩张期），各阶段均留下了独特的文化遗产与历史印记<sup>[1][2]</sup>。

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27—公元前 22 世纪），确立了法老专制政体，农业进步支撑了文明的发展。这一时期以金字塔的建筑闻名世界，建筑师伊姆霍太普为乔赛尔王设计的阶梯金字塔开创了金字塔建筑的先河，高 146.5 米的胡夫金字塔代表了当时工程技艺的巅峰。孟菲斯西岸分布的 80 余座金字塔群，既是王权的象征，也反映出了这一时期古埃及经济的繁荣。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消耗了国力，激化了社会矛盾，加之公元前 2200 年起的持续干旱，最终导致古王国的衰落<sup>[3][4]</sup>。

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21—公元前 18 世纪）法老们着力恢复国力，在经济上通过扩建美里多沃湖等水利工程推动农业的复兴。在军事上征服努比亚获取黄金资源后，于尼罗河三角洲修筑防御工事。这一时期古埃及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浮雕与肖像雕刻技艺

达到了新的高峰，铜器被普遍使用，陶器上也加入了彩釉绘画。但过度的开发导致了国家经济疲软，西亚移民的涌入也削弱了法老的统治。公元前 1650 年喜克索人建立外族政权，虽引入战马、复合弓等新技术与艺术形式，却使埃及文明面临着危机。最终上埃及的底比斯王朝崛起，打败喜克索人，完成了驱逐外族、重新统一的历史使命<sup>[5][6]</sup>。

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16—前 11 世纪）标志着古埃及文明的巅峰，图特摩斯三世将疆域扩张至叙利亚和努比亚，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和奴隶。法老们信奉太阳神阿蒙，并为其大兴土木建造了宏伟的神庙，拉美西斯二世更是成为了古埃及历史上建造宗教建筑最多的法老，他与赫梯帝国缔结了国际条约（现存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际条约）。此后古埃及国力渐衰，相继被利比亚、努比亚和亚述入侵。公元前 525 年被波斯征服，公元前 332 年并入亚历山大帝国。随后的托勒密王朝（公元前 305—公元前 30 年）虽保留了古埃及的传统建筑与宗教，但因内斗不断，最终被古罗马吞并，法老时代宣告终结<sup>[7][8]</sup>。

古埃及文明的衰落与外族统治的更迭，为文物的流失埋下了隐患。在被古罗马吞并后的漫长岁月里，古埃及文明逐渐被伊斯兰文明取代，民众对自身历史的遗忘使得古老建筑与文字失去了保护，部分建筑甚至因被误认为藏有宝藏而惨遭拆毁。1798 年拿破仑远征埃及，虽带来了科学考察的契机，却也因为《埃及记述》引发了欧洲对埃及文物的狂热追捧，大量以寻宝为目的的挖掘在埃及四处展开，无数文物被“抢劫”和“破坏”。此时的埃及内忧外患，穆罕默德·阿里政府推行现代化政策，对欧洲敞开国门，欧洲各国驻

埃大使趁机成为文物交易的主导者。法国总领事德罗威、英国领事萨尔特等人通过倒卖文物牟利,将拉美西斯二世胸像等珍贵文物倒卖运往欧洲。普鲁士等国的远征队亦在王室的支持下在埃及大肆进行考古发掘,因为早期的考古技术并不成熟,学者对出土文物缺乏科学的记录,加之当地居民拆毁神庙石块用于修葺房屋,使得大量古埃及文物遭到了破坏并在混乱中流失,成为文明传承中难以弥补的损失<sup>[9][10][11]</sup>。

## 二、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埃及国家博物馆又称埃及国立博物馆、开罗埃及博物馆,始建于1858年,由法国著名考古学家奥古斯特·马里埃特主持建造,地址位于开罗布拉克地区尼罗河东岸的航运仓库旧址。当时建馆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展示文物,而是为了阻止埃及文物的外流、由总督赛义德·帕夏授权建立的存放文物的场所,并于1863年正式对外开放,命名为“布拉克博物馆”。

但“布拉克博物馆”并不是埃及的第一座“博物馆”,也不是第一个官方的文物存放点。早在1835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就颁布了禁止出口埃及文物的法令,随后由法国设计师南·德·贝勒丰负责设计和管理,建造了专门存放文物的官方机构,命名为“阿兹巴基亚花园博物馆”。该馆的藏品主要来源于考古学家们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抢救性发掘出来的文物,以及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命令下从埃及境内各地征集来的零散文物。在此后的20年间,虽然有着禁止出口文物的法令,也建立了存放和保护文物的博物馆,但包括穆罕默德·阿里在内的多名总督依旧将博物馆和馆藏文物看作是私人财产,随意进行处置。1855年总督阿巴斯一世更是将绝大多数的文物赠予给了访问埃及的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直接导致了“阿兹巴基亚花园博物馆”因没有藏品而被迫闭馆停运,结束了其短暂的生命。因为文物近乎全部流失,以及缺少作为博物馆的系统性功能,因此“阿兹巴基亚花园博物馆”并不能看作是“布拉克博物馆”的前身,只能算是埃及的博物馆雏形<sup>[12]</sup>。

在“布拉克博物馆”建成后的十几年间,馆内藏品数量逐渐饱和,博物馆的空间无法满足文物的存放需求,加之1878年尼罗河洪水泛滥,对博物馆造成了严重的损坏,在综合因素的考虑下,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决定将博物馆进行整体迁移,搬迁到了位于开罗吉萨的一处总督府邸,并于1890年对外开放,但因为场地设施相对简陋,以及国民对建设专门博物馆的强烈需求,决定再次将博物馆进行迁移,因此被称为“吉萨临时馆”。1902年,由文物局负责人加斯东·马斯佩罗主导,法

国建筑师马塞尔·杜尔农设计的“埃及博物馆”正式完工并对外开放,地址位于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埃及博物馆”不同于用作文物存放的“布拉克博物馆”和临时过渡的“吉萨临时馆”,是埃及历史上首个专门为博物馆功能而设计建造的永久性建筑<sup>[13]</sup>。

“埃及国家博物馆”建成后的百余年间,一直是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其建筑本身也已然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董”。随着考古出土的文物数量递增(已达20余万件),原设计容纳3.5万藏品的博物馆已经无法满足文物的存放和展览需求,有超过13万件的藏品被封存于库房。“埃及国家博物馆”内的设施老旧,没有空调且缺乏恒温恒湿系统,部分展厅更是直接暴露于自然光下,加之开罗空气中的污染,导致馆内的文物出现破损,如木棺干裂、石雕开裂、装饰用的金叶和木片脱落等现象。作为百余年的“老馆”,更是缺乏教育互动区、数字体验区等现代博物馆标配的功能性体验区,严重影响了观众的参观体验。“埃及国家博物馆”不仅在展出环境上对文物的保护能力较弱,在安全方面亦是如此。博物馆内监控摄像头较少,监控盲区高达40%,也没有健全的安保系统和预警系统。2011年埃及爆发了文化和社会革命,人们冲进博物馆,洗劫并破坏了大量的文物。由此可见,建造一座集专业性、安全性为一体的现代化超大型博物馆就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sup>[14][15]</sup>。

“大埃及博物馆”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诞生的,该馆于2003年公布竞标与实施计划,原定于2023年11月开馆,官方却宣布推迟到2025年11月开馆,地址位于开罗现代建筑群与以金字塔为核心的埃及古文化区域之间,目前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已经完成,但仅部分区域对外开放。“大埃及博物馆”的建造过程长达20余年,花费超10亿美金,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sup>[16][17]</sup>。

## 三、博物馆对古文明的诠释

古埃及文明的物质遗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博物馆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诠释逻辑。从早期的零散存放,到系统的历史叙事,再到现代的多元视角,埃及国家博物馆始终在回应着一个核心命题:如何让沉默的文物成为文明的“讲述者”。这种诠释的演变,既受制于时代的认知水平,也折射出人类对理解文明遗产的不断深化过程。

阿兹巴基亚花园博物馆(1835—1855)作为埃及首个官方文物存放机构,其对古埃及文明的诠释尚处于萌芽状态。该馆藏品的展示缺乏系统性规定,雕像

与陶器随意堆砌，铭文未加释读，甚至部分文物被当作“异域奇珍”单独陈列以招待外宾。此时的“诠释”更接近“陈列”，既未按历史时期分类，也未解读文物背后的社会功能，仅通过文物的“古老性”暗示埃及文明的悠久，却忽视了其内在的文化脉络。这种局限性，本质上是将文物视为“战利品”或“装饰品”，而非文明的载体。

1858年布拉克博物馆的建立，标志着古埃及文明诠释的第一次转向。作为“阻止文物外流”的产物，其核心使命是“留存”，但这种留存却也暗含了“归属”的意味。馆长奥古斯特·马里埃特作为专业考古学家，首次尝试按“材质与用途”对文物进行分类：石器区集中展示神庙雕像，陶器区按器型排列，墓葬品单独成组。更重要的是，他为每件文物都标注了出土地点（如“孟菲斯出土”“底比斯墓葬”等），并在展厅悬挂简易地图，映射文物与古埃及地理空间的关联。例如，将来自上埃及的白色石灰石雕像与下埃及的黑色玄武岩雕像分开摆放，呼应了古王国时期“上下埃及”的对立与争斗。虽然此时尚未形成清晰的历史分期意识，但“按用途归类”与“地理关联”的尝试，突破了阿兹巴基亚时期的随意性，开始将文物视为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

1890年启用的吉萨临时馆，因场地简陋且处于过渡状态，诠释方式未发生根本突破，但考古发现的激增推动了内容的拓展。随着19世纪末考古技术的进步，来自古王国金字塔群、中王国水利工程遗址及新王国神庙的文物大量被收藏，临时馆不得不增设“时期展区”。将乔赛尔王阶梯金字塔的石块、中王国的彩陶器皿与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进行分区陈列。这种模糊的“时期划分”虽未形成系统的叙事逻辑，却也首次让观众感受到了古埃及文明的“阶段性”。值得注意的是，临时馆首次引入了“对比展示”。例如，将新王国时期的青铜武器与喜克索人带来的复合弓并列，映射外族入侵对埃及文明在技术方面的影响。这种简单的“动态观”，为后续的历史分期诠释奠定了基础。

1902年落成的埃及国家博物馆（开罗主馆），实现了古埃及文明诠释的系统化飞跃。建筑师马塞尔·杜尔农的设计本身就暗含叙事逻辑。主展厅以“时间轴”为线索，从入口到出口依次呈现“前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后王朝”的序列，每个时期配以“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单元。例如，古王国展区以胡夫金字塔模型为核心，周边陈列测量工具、劳工陶罐与法老雕像，诠释“金字塔不仅是陵墓，更是中央

集权的工程结晶”。

该馆最具突破性的是对“非王室文物”的重视。在传统认知中，古埃及文明的诠释多聚焦于法老与神庙，但开罗主馆专门设立了“民众生活展厅”，展出农民的镰刀、纺织工的纺锤、儿童的玩具与信件泥板等物品，甚至还原了中王国时期的村落布局。此外，馆内首次系统展示了文字的演变。从象形文字的铭文石碑，到僧侣体的纸莎草文书，再到世俗体的商业契约，通过文字载体的变化来诠释文明的传承与适应。

但受限于20世纪初的认知，开罗主馆的诠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过度强调“王权叙事”，对女性角色与外族贡献的呈现不足。以静态展示为主，缺乏对文物功能的动态还原。宗教解读停留在“神系介绍”，未深入探讨其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联。即便如此，其“历史分期+多元维度”的框架，仍成为此后百年古埃及文明诠释的模板。

进入21世纪，大埃及博物馆的规划与建设标志着古埃及文明的诠释进入了“现代性转型”的阶段。该馆从设计理念到展示逻辑，都突破了传统模式，试图构建“全方位、沉浸式”的文明诠释体系。

在叙事框架上，大埃及博物馆不再局限于“时间线性”，而是采用“主题辐射”与“时空交织”相结合的方式。核心展区“文明的长河”以尼罗河为隐喻，串联起“起源（前王朝）—成型（古王国）—发展（中王国）—鼎盛（新王国）—转型（后王朝）”共5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设置了“社会切片”子主题，如古王国的“金字塔与平民”，通过劳工宿舍遗址、面包模具与法老雕像的并置，打破“金字塔仅由奴隶建造”的刻板印象。

在技术应用上，数字化成为诠释的重要手段。馆内设置“虚拟复原”区，通过3D建模还原卢克索神庙的祭祀仪式，观众可佩戴VR设备亲身参与拉美西斯二世的加冕典礼。“文字解码”互动台允许观众扫描铭文石碑，实时查看象形文字到现代语言的转换，并了解其背后的历史语境。“文物背后”展区通过显微成像技术，展示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上的工匠指纹，让观众感知“文明的温度”。大埃及博物馆对古埃及文明的诠释引入了“当代视角”，如专门设立的“文明对话”展区，将古埃及的水利技术与现代尼罗河的治理进行对比，探讨“环境与文明存续”的永恒命题。

“文物保护”透明实验室向公众展示修复过程，诠释“传承不仅是保存，更是延续生命”。教育区针对儿童设计“古埃及小工匠”体验课，通过制作彩陶、临

摹象形文字,让年轻一代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这种从“历史回顾”到“当代连接”的延伸,让古埃及文明的诠释不再是“过去时”,而是成为与当下对话的媒介。

从阿兹巴基亚花园博物馆的零散堆放,到大埃及博物馆的数字互动,埃及国家博物馆对古埃及文明的诠释,在“存放—保护—展示—传播”中逐步演进。这种演进不仅是技术与理念的进步,更是人类对“文明本质”认知的深化。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古董”,而是承载着人类共同记忆的“活态遗产”。

#### 四、结语

埃及国家博物馆的百年变迁,是古埃及文明的守护史,也是人类对文明遗产认知的深化过程。从阿兹巴基亚花园博物馆的雏形,到布拉克博物馆以“存放”对抗文物流失,开罗馆构建系统性历史叙事体系,再到大埃及博物馆的数字化转型,每一次演变都存在着教训与经验。对中国博物馆而言,应吸取其教训借鉴其经验,强化对文物的系统性保护,避免“重发掘轻保护”的现象。在对文明的诠释上要兼顾历史脉络与人文精神,结合数字技术打破时空的壁垒和限制,设计贴近公众的体验活动,让文物成为有温度可感知的记忆载体。

#### 参考文献:

- [1] 张振鹏.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件大事[M].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2.
- [2] 颜海英. 金字塔的国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4.
- [3] 王光镐. 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下)修订版[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23.
- [4] 林靖. 世界上下五千年[M].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7.
- [5] 赵东福. 历史的步伐[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6] 李清敏. 不可不知的古埃及文明史[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0.
- [7] 鲍勃·布赖尔, 杜辉. 图坦卡蒙和改变世界的陵墓[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24.
- [8] 西尔维娅·埃诺迪, 桑巍. 开罗埃及博物馆[M]. 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 [9] 菲利普·大卫里奥, 李婧敬. 浓缩人类文明的34座博物馆[M].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3.
- [10] 袁宙. 法老们的遗憾——埃及古文物面临严重威胁[J]. 阿拉伯世界, 1992(1):76-78.
- [11] 穆罕默德·杰马勒·拉希德, 滕曼. 2011年革命后的埃及博物馆[J]. 国际博物馆(中文版), 2017(Z1):94-98.
- [12] 黄培昭. 在大埃及博物馆穿越5000年[N]. 环球时报, 2023-03-07(009).
- [13] 李仲秋. 大埃及博物馆,埃及[J]. 世界建筑, 2007(5):118-119.